

DOI:10.12154/j.qbzlgz.2019.03.002

从“有形学院”到“无形学院”*

——高校智库建设的逻辑与组织结构模型

袁曦临^{1,2} 刘利^{1,3} (¹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1189; ²东南大学图书馆 南京 210096;
³东南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南京 211189)

摘要 文章从高校智库“场”知识流动的规律出发,采用平行基金运行模式,构建多主体高校智库无形学院组织结构模型,该模型有助于解决高校智库的跨领域合作、跨学科研究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重塑并创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形象。

关键词 高校智库 无形学院 场域 知识流 平行基金

From "Tangible College" to "Invisible College":

Logic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Model of University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Yuan Xilin^{1,2} Liu Li^{1,3} (¹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²Southeast University Library, Nanjing, 210096;
³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fic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211189)

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model of the invisible college of multi-subject university think tank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law of knowledge flow in the university think tank, supported by parallel fund, which will help to solv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think tank, and remold the image of new type university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university think tank, invisible college, field, knowledge flow, parallel funds

1 引言

2014年教育部教社科[2014]1号文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通知^[1],明确提出要支持、培养、打造高校智库品牌。众所周知,高校拥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科专家,对于复杂问题,理应能够整合各类专家资源,协同完成任务。但事实上,目前的智库

研究仍以单向度为主,在面对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时,表现出研究碎片化,协同不足等问题^[2]。究其根本,高校智库目前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是根本原因之一。在目前的高校智库建设中存在一种模糊认识,即大学智库只是某个院系或研究基地、研究中心或高级研究院的另一块牌子而已。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也仍以学术论文或专著为主,而对于咨询报告、政策建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高校智库协同发展模式及其路径选择”(编号:ZDIXM018)的研究成果。

议、发展规划等智库产品重视程度不够。从组织结构上讲,绝大多数高校智库隶属于某个具体的学科或院系,其研究人员主要由这些学院的相关师生充当。

事实上,高校智库与大学院系,无论是在研究性质,功能定位还是服务对象等方面都有本质差异,院系的职能是以学术为志业,研究为天职,而智库的职能在中央文件中有明确界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研究咨询机构。”就智库的产出而言,通常是面向社会问题或社会的委托需求,在对社会现实问题深入调研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方案,以影响社会公众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认知及态度,塑造或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

因此,高校智库的建设发展路径显然应该异于院系或高研院的模式,这不仅是由其功能定位决定的,更是其研究指向决定的,模糊这两者的关系,必将影响到高校智库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跨越学科和院系壁垒,在校园内外形成知识技能互补、协同合作并相互承担责任的智库研究人员群体,建立高效流畅的知识交流和共享机制,是高校智库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2 高校哲学社科创新科研模式的四个阶段

米歇尔·福柯认为,“学科构成了话语产生的一个控制系统,它通过统一性来设置其边界。”^[5]任何学科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社会规范。因此伯顿·克拉克才会说,大学就是一个由学科和院校交织而成的“矩阵结构”(Matrix Structure)^[6]。然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问题总是以整体的面貌出现,涉及不同的知识领域,常常不能够被精确的划归于某一学科,这就产生了跨学科研究。为了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的融合与创新,高校在科研管理层面进行了相应设计,为研究人员创建新型的研究基地和研究平台。就我国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

(1)1990年中期之前,人文社科研究主要以院系为中心,人员管理实体化,基本不存在跨学科、跨校或跨领域合作,绝大多数院系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著名大学也概莫能外。

(2)2000年之后,“211”和“985”工程开始实施,研究型大学日益突出科研导向。教育部启动了一系列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研究中心,例如2000年正式成立的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该

中心既是产研一体的科学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也是南京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5]。这类研究基地或研究中心,主要依托某个具体院系或院系的某些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但在实际运作和发展过程中,没有国家和大学的支持,其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是有限的。

(3)2005年之后,“高研院”性质的创新平台开始出现,例如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研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研院等。此类平台多采用“知名学者+课题+研究团队”的模式,科研与教学双导向,有明确的科研与发展规划,拥有一定的人事权、财务权,主要研究人员的编制基本隶属院系,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高校内部的人员半流动模式,属于校级的半实体性质研究机构。其主要职能除了教学研究之外,还包括举办各类型讲座论坛、学术会议,组建跨学科研究基地和各类型文科实验室,推进国际交流和人才培养等。

(4)2014年全国高校社科科研管理研究会工作会议提出,社会科学需要总体规划,要走内涵式发展的综合创新之路^[6],重点是要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新型智库,以问题为导向,以任务为牵引,实现高校智库与政府决策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同创新。由此,高校哲学社科创新科研模式进入发展的第四阶段。打造高校新型智库,培养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人才和咨政研究团队,成为目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科研平台建设和发展的重心。

3 高校智库的功能定位及其本质特征

智库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科研机构,它是提供决策咨询类产品,以知识产出为宗旨的社会性组织,其生存与发展有赖于同社会的交换,而交换的产品是面向政府与社会决策需求的^[7]。高校智库也不例外,其本质特征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基本方面。

3.1 面向问题,知行合一

从功能定位上讲,高校智库不应该是阳春白雪的象牙塔,而是一种面向现实问题存在的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研究机构。智库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用户委托”,智库研究者的任务是提出用户需要的切实可行的咨询报告和政策实施方案^[8]。换言之,智库研究需要得到政府、社会与公众的认同和支持,才能够影响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进而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 Mc Gann 博士领衔的“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TTCSP)项目组从2006年开始发布《全球智库报告》,并公布年度全球智库指数(Global Go To Think Index),用以综合评价智库的形象、能力以及表现,其量化标准中就包含智库参与公共政策数量、智库成果被公共政策引用数量等^[9]。

对于高校智库而言,学术创新虽然是必须的,但从研究性质看,智库研究往往是多元集成的“跨界”研究,诸如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其研究重点必然会放在复杂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层面,需要审时度势给出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咨询和决策建议,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学科性理论研究。

3.2 政策研究,舆论导向

就研究产出而言,高校智库提出的思想观点、政策主张、规划方案等,显然不等同于学术论文等成果产出,因而对其评价也不能够局限于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圈内部的同行评议,而需关注社会效用评价,需要提交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和社会公众,获得采纳和落实。因此,对于高校智库而言,就存在如何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使之迅速传播,形成社会舆论,最后落到现实层面的问题,这也是智库研究区别于学科性研究的一个本质特征。学科研究可以坐冷板凳,可以曲高和寡,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但智库研究不行,智库研究需要社会接受和大众反馈。

伴随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智库的舆论扩散愈发倚重新媒体技术。智库在媒体上发表见解、文章,解读国内、国际问题和公共政策,在客观上承担了舆论领袖引导、影响舆论的功能。因此,高校智库研究需要走出校园,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在社会公众与政府官员之间搭建发布研究成果的传播载体和交流平台,传播研究观点与思想,塑造舆论。

4 无形学院:高校智库建设新模式

上述功能定位与本质特征,决定智库的建设和发展难以局限在某一学院或系所的围墙之内,如果局限于校园,不仅没有发展前途,也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寻求新型建设发展模式。

著名科学史学家D. 普赖斯1982年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提出,学术共同体内存在两种群体,一是通

过正式的学科建制组织起来的院系,即有形学院。如朱丽·汤普森·克莱恩^[10]在《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中所指出的,大学院系是一种发展专门化知识的社会建制,专业教学、研究人员及管理人员等汇集在一起,从而确立学科的地缘版图;另一种是通过信息网络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非组织化的学术群体,即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无形学院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组织松散、无形式上约束,却具有强烈学术凝聚力的学术群体。其前身可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皇家学会,最初只是一种科学家定时定点的聚会形式,除了聚会,成员间还经常通过书信,交流彼此的研究进展。普赖斯所定义的“无形学院”,是一种没有严格管理机制和不构成体系的组织结构,松散、非正式的交流方式+实际存在的学术讨论强需求,使得这一非正式组织内部的学术交流快速、灵活而高效,弥补了“正式”的有形学术团体内部信息流通滞后,准入门槛高,管理层级固化等不足。

4.1 无形学院的运行特点

普赖斯发现,与正式的学院建制相比无形学院有其鲜明特点,表现为:

(1)无形学院的成员通常有一致的关注问题或共同的研究兴趣,有探究和讨论的动力;能够有效跨越学科边界,促进成员间的交流和合作。

(2)无形学院的成员大多隶属不同研究领域与不同机构,对于无形学院的成员而言,信息有效流通的重要性大于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的明确性。

(3)无形学院的组织结构形式松散,成员人数不固定,无形学院内的知识分享和知识交流扮演了推动研究发展的凝聚力和纽带角色。

与科层制的有形学院相比,无形学院的成员不以地理上的接近和所属的地位为基础,而更多由于他们对一组问题的特定研究路线有共同的信奉而聚在一起^[11]。黛安娜·克莱在其所著《无形学院》中指出,正是这种交流把许多合作者群体联系在一起,研究者之间形成的交流网络才是“无形学院”的本质。“无形学院”中学者的“跨界”交流,实质上正是知识和思想的融合,它使每个人的知识成为公共学术资源。黛安娜·克莱进一步指出,在无形学院中知识增长既是社会过程也是认识过程,社会互动加速思想的传播和扩散,从而使得该研究领域的知识积累增长成为可能,同时,研究者

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其自身知识的累积性增长^{[11]24-26}。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学者凭借社交媒体,不仅能完成知识分享,也可以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情感分享、文化传播,甚至身份认同的建构。

4.2 高校智库“无形学院”的建设逻辑

无疑,智库更多表现为是一种合作性研究模式,这种以合作为中心的研究群体正符合“无形学院”的形态。国际知名智库往往聘请不同工作经历、学术背景、政治观点,甚至种族、性别的兼职研究员作为教职研究员、顾问研究员和客座研究员。1968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依(Aurelio Peccei)邀请来自10个国家,污染、资源、农业、人口、管理、资本甚至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如何面对“人类的困境”,随即成立了自称为“无形学院”的罗马俱乐部。1970年罗马俱乐部以麻省理工学院杰伊·福雷斯特^[12]教授开发的World3模型为基础,开始考察一些可能限制人类增长的相关因素,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20世纪90年代初又增补近20年的数据,再次利用World3模型进行分析并出版了《超越极限》,研究支持并加强了20年前的结论^[13];2002年出版《增长的极限-30年更新》,尝试用模型和场景去分析和量化人类生活的自然限度。2009年多位科学家联名在*Nature*杂志发文^[14]比较了报告中的预测和现实数据,发现1970~2000年间的历史数据吻合了模型在“标准运行”场景下的同期预测;结果预警地球正在接近人类行星所能承受的界限,全球系统有中途崩溃的危险。

智库“无形学院”在地理上可以是分散的研究者簇,研究者们出于对某些问题或项目的共同关注和研究兴趣构建交流网络。因此,现代智库的组织结构应该是一种“网络平行组织”,而不应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孤岛”或“谷仓”。如何整合资源,将“无形学院”的知识交流互动与身份认同建构等理念落实到高校智库的具体建设中,创新智库研究人员的合作模式形成有利于协同创新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长效机制,是高校智库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具体说来,就是如何实现校园内外、院系内外研究人员的信息流通、知识交互以及协同合作,并解决此过程中涉及的资源配置、任务分配、利益分享和效率评估等复杂问题。

在社会学领域,“场域”(field)是皮埃尔·布迪厄^[15]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场域就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换言之,场域是相同或相近的社

会个体进行某种社会活动的空间场所。每个场域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禀性”——即布尔迪厄所谓“惯习”,惯习的倾向使得行动者偏向于选择根据他们的资源和过去的经验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方式,可以说,场域形塑了惯习;与此同时,场域中也存在着各种“博弈”(game),而决定竞争博弈的逻辑是“资本”,布迪厄把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种类型。在一个场域中,“惯习”和“资本”是活动博弈的决定因素,两者决定了场域活动的形式与结果。如果一个场域的自主性越大,那么它对资本的依存性就越小,这个场域的语言就越具有科学性。正如布迪厄指出的,自主性最强的场域无疑是科学场域,从某种意义上讲,学院是一个自治的场域。

不难看出,高校智库无形学院也是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存在着不同力量的竞争,这些力量存在于校内智库研究者与委托方譬如政府之间,也存在于合作方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譬如大众媒体等之间。高校智库的“惯习”不仅体现为高校院系本身所具有的学术特质,也包含智库所具有的市场性、应用性等社会特质,因此相比于学院场域,高校智库这一场域的自主性要弱一些,更多受到外在“资本”的影响。作为一个从事于咨政和社会实践的空间,高校智库的“惯习”和“资本”是其进行智库咨询实践的逻辑与工具^[16]。

在知识管理领域,野中郁次郎(Nonaka)等学者也提出了“场”(Ba)概念。认为Ba是知识创造、共享、活动场所共有的环境,既可以是物质的如办公室、实验室;也可以是虚拟的如学术社区、数据平台等;甚至是精神层面的,如学术信仰和政治共识等;抑或是上述这几种的组合。总之,“场”提供了一种共享空间来促进个人或集体知识的交流;野中郁次郎对Ba进行了分类命名:始发场、对话场、系统化场和练习场。始发场即个人共享经验、感情、情绪与心智模式的地方;对话场是集体内部的面对面交互;系统化场是集体凝聚的显性知识的呈现;练习场是个体之间的虚拟性交互。

依据“知识场”理论,高校智库不仅是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的重要场所,也是知识转化和创新的基地。以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院系、研究内容、交流平台为核心,可以形成知识源发场(包含个人和集体)、知识实验场与知识互动网络场,这三层知识场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贯穿其中的是知识流,知识流可以理解为智库研究内容的生产、分享、交流、扩散。

5 高校智库“无形学院”的组织结构模型

结合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场”理论,可以对高校智库这一场域中各自力量的博弈及其知识流动进行分析和阐述,进而描述并且建构高校智库无形学院的组织结构模型。

5.1 高校智库的知识流动形式

高校智库在完成研究任务的每一个活动环节中,都存在着来自智库所在高校内部与外部知识的流动与转换,智库研究是一个循环流动以及在流动中不断增值的知识生产过程。

(1)高校智库与外部的知识流。智库内部的知识需求是驱动外部知识流入的知识泵,外部知识源可以包括各种数据库、知识库、个人(例如行业专家,外科学者)和组织(例如政府部门、企业、媒介)等。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祛魅化”已经成为普遍现实,知识精英越来越多地走出校园“象牙塔”;校园内部的学术空间逐渐转向了校园外部的公共空间,通过网络放大效应和大众化“撒播”机制,校园内部知识越来越多外溢到网络公共空间。在过去被视同为“专业性”的问题,日益转变为公共性社会议题,各学科专家的参与、网民的发帖互动在网络“无形学院”异常活跃,并在激烈争论中渐成共识^[17]。

(2)高校智库内部的知识流。主要表现为高校智库内部不同学院机构之间的跨学科知识流动。智库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复杂和综合性问题,体现了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的深度结合,必须要通过多学科的协同合作,发挥学科集群功能,才能破解学科的局部性与研究问题整体性的矛盾。

(3)围绕智库咨询项目的知识流。智库研究,究其本质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的系统研究,而问题导向的研究需要大量的事实、数据为依据,需要深入社会、深入民众、深入“田野”,目前许多政府决策部门的数据不仅在建设层面非常欠缺,而且在获取层面也普遍存在开放度不够的问题,即便是各级各类政府部门之间,彼此的数据和信息也呈“孤岛”状态,无法实现有效关联。消除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渠道阻塞正是智库研究的

基本任务。

事实上,“旋转门”机制正是一种保障不同观点交锋和抗辩的制度性设计。美国的大学智库往往建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汇集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等各方面精英人才,通过“旋转门”制度让优秀的智库研究者到政府有关部门任职,将自己的理论研究直接作用于政府的实践工作中去,同时,也接受政府离职的官员进入智库,以拓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渠道。有意识地定期举办学术会议、专题讨论会和演讲报告会,邀请各方面人士尤其是政府高层官员参加,在提升研究针对性的同时,将智库最新研究成果向官员推介,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

5.2 高校智库无形学院多主体组织结构模型构建

考虑到高校智库受其内在“惯习”和外在“资本”的“博弈”影响,结合智库“场”的知识流动特点,本研究构建了高校智库无形学院多主体组织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该结构模型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知识源发场、知识实践场、知识互动网络场,分别对应着智库研究的三个层次:校内外专家协同研究、智库研究实践应用、智库成果网络播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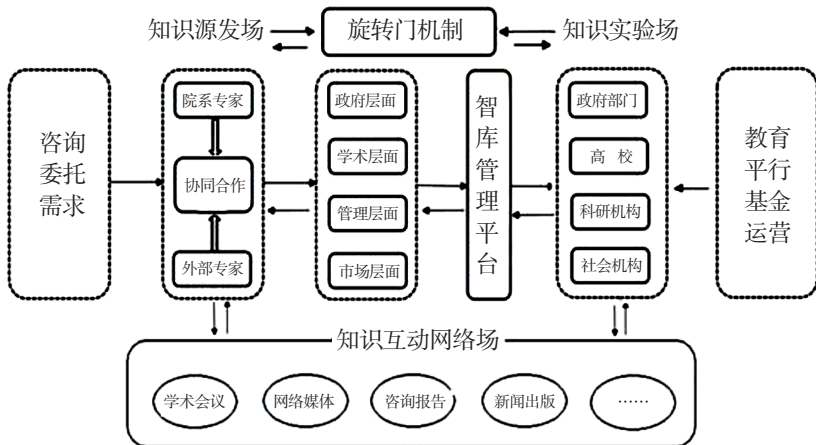


图1 高校智库无形学院多主体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型

在知识源发场,主要涉及校园内外部专家和研究者之间的知识荟萃和知识创造,其内部与外部涵盖政府、院系、市场与管理各个层面。

在知识实验场,主要涉及智库研究成果的落实、转化与验证,因此需要与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以及社会机构广泛接洽与合作。国际知名智库之所以较少依赖大部头、连篇累牍的研究,而更偏爱使用朴实无华、易于理解的语言撰写观点简明的报告和声明,提出明确的

建议和未来可能的方案,原因即在于智库研究具有知行合一的本质特征。

在知识互动网络场,主要涉及舆论的传播与扩散,因此智库的产出不可能是束之高阁的文本,而需要积极与媒体接触,在信息播散中扩大影响。在过去,其主要领域是在新闻出版与电视传媒,目前越来越多地转移至互联网。事实上,近10年来国内思想论争中最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例如社会转型中的反腐问题、公正问题,甚至更为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如人口、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都是在网络热论中聚焦的。

概括地说,智库无形学院多主体组织结构模型可以表述为:高校智库的研究者承担了“知识源头”的始创作用;政府、社会扮演了“客户需求”角色,市场和风险投资机构扮演了“资本投入”角色,发挥支持和推动作用;而高校管理者则扮演了“网络管理”角色,起到行政、协调和监督、服务作用^[8]。

该模型试图体现“惯习”与“资本”对高校智库运行的深刻影响,“学术研究性”作为一种“惯习”,体现为校园内部不同学科、不同部门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互动,也表现为校园之外研究人员间的协同研究;智库管理平台的职能是提供智库研究团队内部与外部的知识共享、连通及其管理。唯此,才有可能形成理论与实践优势的双重叠加,使研究成果既有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又有政策价值和实践价值。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综合社会调查项目(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就组织结构而言,GSS的理事会和大会成员广泛分布于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GSS的理事会分管财政预算、决策、行政等方面。GSS的网站除了提供原始调查数据外,还提供与数据集相关的出版物,诸如引用GSS数据集的书目、年报、书籍、历年调查问卷等^[9]。

5.3 智库无形学院平行基金运行模式

高校智库的可持续发展,如果缺乏确定的资本支撑是难以为继的,特别是涉及多机构、跨部门、跨领域的智库无形学院,采用既有的学院管理、研究中心或高研院管理模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无法解决专职和非专职的聘用问题以及相关的成果推广与营销等问题,既有模式与高校智库的运作较难匹配,有其局限性。

针对这一问题,在上述多主体组织结构模型架构中,提出采用教育基金会的运营模式,也许是较为恰当的选择,而且已有成功的案例可循。耶鲁捐赠基金是全球最成功的学校捐赠基金,以20.2%的投资回报率领

跑全球高校基金,被称为“耶鲁模式”^[20]。在我国,教育基金会起步较晚,我国法律将教育基金会定位为纯公益性质,因此照搬欧美大学的投资管理模式显然不符合国情,但在一定层面采取“平行基金”的运营思路却具有现实可行性。

平行基金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公益性基金,另一为商业性基金,公益性基金与商业性基金平行运行。商业性基金的盈利来自投资收益,采用国际通行的PE管理模式,管理公司分享基金收益的20%。管理公司由公益性基金主导设立,其20%的业绩报酬捐赠给公益性基金,补充公益性基金的资金来源。公益性和商业性基金在法律上各自独立,平行存在。不难看出,高校智库参照教育基金会的平行基金模式是具有可行性的,一旦智库委托研究项目确定,即可向公益性和商业性基金同时推荐项目,申请所需投资的款额。投资之后,管理公司直接参与所投项目的运作及管理,帮助其成长。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投资教育基金即是人大校友裘国根2012年通过其创办的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向母校捐赠2亿元人民币设立的。此捐款中相当部分用于建立重阳金融研究院。2013年1月成立的重阳金融研究院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投资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裘国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次的捐赠,我们出钱,同时代为管理,这是一种全新模式的开创。”^[21]事实证明,这一模式是成功的,重阳金融研究院目前已经跃升为国内外知名智库,完成了一系列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研究项目,包括G20、一带一路、绿色金融等有特色的金融研究。

6 结语

高校智库是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中思想最为活跃的场域,亦是思想传播最为迅速的集散场。高校智库的研究者大多数是学校内部的学者,其研究能力和水平无疑是令人信服的,但就智库研究而言,表现尚不尽如人意,存在理论与现实脱节、研究碎片化等问题,原因在于高校内部的研究者不够了解社会、政府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于公共决策的准确定位和现实把握,协作研究匮乏,事实数据支撑不足,导致高校的智库研究往往不容易有现实指导性、前瞻性和预见性,这一现实在目前的高校智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因此,从高校智库“场”知识流动的规律出发,综合

考虑高校智库“场域”中“惯习”和“资本”的“博弈”影响,消除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交流障碍,构建高校智库无形学院多主体组织结构模型,不仅是必需的,也是迫切的。采用平行基金运行模式,能够解决高校智库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该模型有助于解决高校智库的跨领域合作、跨学科研究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重塑并创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形象。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4)1号文[EB/OL].[2019-03-19].http://www.moe.edu.cn/srcsite/A13/s7061/201402/t20140212_164598.html.
- [2] 高培勇.深入认识智库的特殊运行规律[N].人民日报,2017-03-07(07).
- [3] 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99.
- [4] Clark Burton. The problem of complexity in modern higher education[C].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University Since 180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63-279.
- [5]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EB/OL].[2019-03-19].<http://cssrac.nju.edu.cn/a/gywm/zxjj/>.
- [6] 邢兆远,李建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创新[N].光明日报,2014-07-21(06).
- [7] 李安方,王晓娟,张屹峰,等.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87.
- [8] 李刚.哲学社会科学的“智库范式”[J].理论与现代化,2017(3):20-22.
- [9] James G McGann.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2011[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2.
- [10] 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1] 黛安娜·克兰.无形学院[M].刘君君,顾昕,王德禄,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3.
- [12] 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增长的极限[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13] 奈勒·H.梅多斯,丹尼斯·L.梅多斯,约翰·兰德斯.超越极限[M].赵旭,周欣华,张仁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14] Rockström J, Steffen W, Noone K, et al.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J]. Nature, 2009, 461(7263): 472-475.
- [15]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9.
- [16] 张碧红,雷天玥.分化与共生: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当代阐释——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探索性研究[EB/OL].[2019-03-19].<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228/c411112-29113496.html>.
- [17] 林芯竹.为谁而谋——美国思想库与公共政策制定[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52.
- [18] 黄晓霞,丁荣贵,于双阳,等.多主体协同创新项目治理网络构建——基于欧盟第七框架计划的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36(12):98-108.
- [19] 张计龙,朱勤,殷沈琴.美国社会科学数据的共享与服务[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5):13-17.
- [20] 劳伦斯·E.科卡德,凯瑟琳·M.利特里瑟.基金会和捐赠基金投资[M].郑佩芸,蔡洵,黄磊,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 [21] 重阳金融研究院[EB/OL].[2019-03-19].<http://rdey-sf.ruc.edu.cn/>.

[作者简介]袁曦临,女,1968年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刘利,男,1976年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2018-06-22

欢迎订阅

复印报刊资料 《出版业》

《出版业》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精选国内千家报刊,荟萃国际学术精华。刊物关注国家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反映出版业界的改革与发展;精选出版理论研究方面的优秀学术文章;研讨各类图书与期刊的编辑、营销、发行等工作以及国外出版方面的研究成果,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是出版业内外同仁交流、收获的平台。

栏目主要有:发展战略、学术平台、业界观察、数字出版、出版法苑、书业经纬、期刊纵横、编校实务、出版史论、环球出版、探索与争鸣等。

《出版业》为月刊,大16开,80页,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期定价19.00元,全年定价228元。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59号文化大厦1301室

编辑部电话:010-82504550-2165

营销热线:010-82503438、82503439、82503412、82503029

网址:www.zlzx.org